



□ 焦国成

“善”：“好生活”的伦理意象

伦理学是关于善的知识体系，因为它力求引导人们去认识善、力行善并达到善生活的理想状态。然而，对于“什么是善”这一看似极简单的问题，却在历史的长河中聚讼纷纭、莫衷一是。在中国思想史上，不论人们对于善的看法是多么的对立，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论善者都共同使用着“善”这一语词。古籍中“善”语词的用法虽然多种多样，但它们无不指向“好生活”。

要搞清楚“善”语词，首先必须从历史文化的视角上厘清人们对于“善”语词的用法。廓清了这个基点，才有可能在历史文化的地基上筑起有民族文化特色的伦理学大厦。《康熙字典》《经籍纂诂》等作为具有很高权威性的文字学著作，在研究了它们之前的古代经籍和古代文字学著作的基础上，曾综述过“善”语词的不同含义。

善字，古文作“𡇗”，结构上“从誩从羊”。善字可以在形容词、名词、副词、动词、感叹词等意义上使用。其含义可以分为如下几类。第一类，作为形容词的善，至少有以下7种用法：吉祥、善良、美好、高明、友好、熟悉、多；第二类，作为副词的善，至少有以下5种含义：很好地、擅长、易于、多、大；第三类，作为名词的善，至少有以下4种含义：善良、通“膳”、姓、通“单”；第四类，作为动词的善，至少有以下9种含义：赞许、稳妥处理、优化改良、擅长、喜好、羡慕、友好、爱惜、揩拭。善字除了上述四类用法之外，还可用于表示同意的应答词或赞赏的感叹词。

以上善字的20多种用法，几乎都是在褒义上使用的。归结起来，善字的主要意思有十种：其一，是指人或者事物在品质上的善良和优越；其二，是指事情的好或美好；其三，是指态度上的喜好、赞许、珍视、爱惜和羡慕；其四，是指技能上的擅长和高超；其五，是指人际交往上的熟悉、亲善和友好；其六，是指行为、风俗上的改善；其七，是指事务上的修治和很好地处理；其八，是指美食，特别是正式宴席上的膳食；其

九，是指数量上、程度上的多和大量；其十，是指未来势头上的吉祥。

语言以及传达语言的文字是思想的载体。从更深的层次说，语言及其传达语言的文字是特定的人类群体长期生活实践的文化积淀。人们在生活实践中，取得了某种认识，把这种认识通过语言表达出来，形成了交流，当这种交流达成共识并趋于稳定的形态时，为了便于在群体中传播，就形成了表达这种思想认识的固定的符号或文字。

“善”语词之中，凝结着善的最抽象的意义，它是千百年来人们形成的文化共识的体现。正是这种文化的共识，使持不同观点的人们能够在一起交流不同的心得，能够在一起争辩，并在争辩之余恪守着相同或相近的生活规则。

善字的用法看起来包罗万象，但实际上都指向一点，那就是好生活。有利于或有助于人们过好的生活的事物、品质、行为、技能、关系和趋势等，都被视为善的事物。一个人在品质上是善的，那一定是有利于过好生活的。我们所用的事物在品质上是优越的，那一定是有利于过好生活的。凡可以称善者，也一定是有利于过好生活的。人们在态度上喜好的、赞赏的、珍视的、爱惜的和羡慕的，无疑可直接导致好的生活，故而均可称为善。技能和特长上的高明，有利于好生活，故而亦称为善。人熟比人生好办事，亲善、友好比敌对和斗争更有利于好生活，当然会被视为善。行为和风俗上的改善，事务得到很好的处理，无疑有助于好生活，故人们把这些也称为善。

至于美食，那更是人生不可或缺的东西，民以食为天，称其为善或膳可谓恰当得很。“大”和“多”代表着程度和数量上的规模和丰富，人们对于好事向来不厌其大其多，对于生产力和尚未发达的古代来说尤其如此，故而其被称为善也就是很自然的了。人想过好生活，莫不忧虑未来，而未来势头和运气上的吉祥可以让人更容易熬过眼下的艰难时节，更可谓善莫大焉。

总之，古籍中关于善的诸多用法，给我们一个十分明晰的印象：善是与人的好生活紧密相关联的一个范畴，即有利于人的好生活的方可称善，反之则不可以称善。

“善”语词的诸多用法中的共通意蕴既然都与“好生活”相关联，那么，这一抽象意蕴必然凝结在“善”字之中。当我们进一步追问“好生活”在原始的意义上究竟何指这样一个问题的时候，善字的结构就会不时地浮现在我们的头脑里：与人的好生活相关联的这个善字，汉字何以写成“𡇗”，为什么在字形结构上“从誩从羊”？

“𡇗”字由虚实两部分组成，实的部分是“羊”，虚的部分是“誩”。我们要弄清善字的本原性含义，就要先审视构成善字的实体部分——羊。

在古代人的心目中，羊是一种好东西。“羊”这个字没有什么神秘之处，就是羊这种动物的象形。谋食可以说是原始人的第一要务，而得到好的食物可以说是原始人的第一追求。对于营养缺乏、饥肠辘辘的人们来说，能吃到肉当然算是好生活了。在孟子的时代，尚把“五十者可以衣帛”“七十者可以食肉”作为一种社会理想，何况在原始时代？原始人在狩猎时碰到一只羊，那可以说是大大的好运了。羊跑得虽快，但与人类相比，耐力较差，也不算很聪明，只要付出一些努力就可以猎到。而且羊不像狮虎那样有尖牙利爪，对人没有致命的威胁。羊肉性温而鲜美，羊皮保暖而轻柔，能猎到一只羊，衣和食便都可暂时无忧了。狩猎时代的人们碰到一只羊岂非大大的运气？因此，把羊作为吉祥和运气的代名词是再贴切不过的了——例如吉祥的祥字。

然《考工记注》何以称羊为善？对于古人来说，羊的首要的或最原初的价值就在于能做成营养丰富、鲜香可口的美味佳肴，即它的膳食价值。在古文中，“善”与“膳”通。“膳，具食也。从肉，声善。”羊的膳食价值在于能保存和活跃人的生命，可以使饱受生存威胁的人们感到高兴和满足。只有人的生存得以保障，其他的

善才是可能的。

在人类历史上，人的生活的改善莫先于、莫大于膳食方面的改善。膳食方面的改善关系到人生存质量的改善。对于古人来说，与这方面的改善相比，其他方面的改善都是次要的。羊作为主膳者，在人类生存改善中起到了奠基性的作用。这样，我们也就明白了为什么膳与善通，为什么称“羊，善也”，为什么善字在字形结构上以“羊”为主体了。善字从“羊”，就是以羊之象形直接表明“善”这个语词的本原性意义在于有益于人类生存。

我们再来看善字的另一个构成部分“誩”。“誩：竟言也。从二言。凡誩之属皆从誩。读若竟。”竟言即争言。善字的结构从誩从羊，显示着善字与人的言语评说有着密切的关系。善字，由二“言”（或二“口”）抬起，意思极其简明，它不过是说人们争言羊是最好的。它对人来说是最好的食物，因而古人在献给神灵的膳食中也以它为最理想。关于这一点，谷衍奎《汉字源流字典》释“善”条云：“善：会意字。金文用羊表示，意为美味，会连连称美之义。篆文整齐化，或简化从一‘言’。隶变后楷书写作𡇗，今规范化用善。……‘𡇗，吉也。从言，从羊。’本义为美好。”这对善字所从“言”之含义解释得甚为贴切，深得善字的本来意蕴与意象。中国古代先民，在狩猎后深感疲惫，夕阳西下，他们坐在地上休息，满足地看着俘获的那只羊，争相感叹：“家里的老人、媳妇和孩子又能饱餐一顿，今天真是个好日子啊！”这就是善的原初含义，这就是我们中华民族伟大的文字，它可以以鲜明的画面感赋予我们和谐的价值观念和饱满的伦理意蕴。



（上接1版）蓬勃向上、浩荡前行的时代生活为文学创作提供了新的题材、新的灵感，不断更新文学的表达方式、拓展文学的边界。我们要以强烈的历史主动精神洞察时代之变、把握时代机遇，找到文学传统与现代生活的连接点，紧扣时代之需，努力形成文学创新发展的氛围和环境，使文学事业蓬勃发展、活力奔涌。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要求新时代文学志存高远。中国式现代化是在改革开放中不断推进的，也必将在改革开放中开辟广阔前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这是文学事业新的历史方位和时代使命。作为强国建设的重要力量，文学必须更为迫切、更为主动地融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进程。这就需要广大作家和文学工作者树立大时代观、大历史观，与伟大的时代一道前进，与伟大的人民共同奋斗，在伟大征程中展开个人的艺术创造，以历史性、总体性视野深刻书写中国式现代化特征，展现中国人民推进和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精神风貌，在宏伟蓝图中铸就闪亮的文学坐标。中国作协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和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高度出发，鲜明提出并系统阐释“新时代文学”的重大意义和目标追求，强调新时代文学是以提高质量为根本，奋力铸就艺术高峰的文学；是以创新为动力，勇于拓展新空间塑造新形态的

文学；是坚定文化自信，光大中国气派、中国风范的文学；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文学；是参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体现人类关怀的文学；是主动融入现代传播格局，有力证明文学地位价值尊严的文学。为推动新时代文学在理论上不断丰富、艺术上不断创新、实践上不断突破，中国作协深入研究探索具有新时代特点的重点创作规划组织模式，组织实施“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聚焦脱贫攻坚、乡村振兴伟大实践，引导广大作家满怀热情描绘新时代新征程中国乡村的巨大变化；组织实施“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引导广大作家向着人类最先进的方面注目、向着人类精神世界的最深处探寻，整合全国优质出版资源共同推出精品佳作；积极探索文学服务人民、服务社会的新途径，助力湖南益阳清溪村打造“文学村庄”，塑造乡村文化振兴新地标，涵养乡村现代文明新生态，形成了独树一帜的新时代“山乡巨变”文学风景。在这个过程中，文学的立意、审美、阅读都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宏伟目标更为紧密、更为契合。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要求新时代文学向新而行。创新是改革的精神特质和动力源泉，是文艺的生命。全会《决定》对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作出部署，以改革驱动创新、以创新引领发展，这对作协工作和文学事业的创新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也提供

了有利条件和强大动力。我们必须进一步转变思维、更新观念，摆脱思维定势、工作惯性和路径依赖，向改革要动力、向创新要活力，不断释放文学潜能、拓展发展空间。中国作协主动识变应变求变、勇于探索创新，通过举办“中国文学盛典”、深化与影视机构和互联网平台的合作，加强文学与新媒体、新业态、新技术的交融交汇，努力融入现代传播格局。积极引导广大作家和文学工作者主动拥抱新变化、研究新规律、树立新观念，创造新的文化形态，创新文化发展模式。加强对网络文学的引导扶持，使网络文学主流化、精品化进程加快，IP产业链条不断完善，对文化产业的内容支撑作用进一步凸显，“网文出海”成为中华文化海外传播更加亮丽名片。不断加强与中国科协等部门的合作，深化对云计算、AI创作、数字阅读等新质生产力要素的研究，推动科幻文学创作和相关产业发展，为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作出积极贡献。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要求新时代文学胸怀天下。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识。不断扩大对外开放、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是我国发展不断取得新成就的重要法宝。只有坚持胸怀天下、秉持开放包容、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才能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赢得优势、赢得未来。文学是一种世界性语言，天然地具有促进交流、增进感情、实现“美美与

共”的作用。中国作协不断加强与对外交流机制化建设，积极开展文学领域各项合作，努力推动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以文载道、以文传声、以文化人，为营造良好国际环境贡献力量。全会刚刚闭幕，我们即在杭州和北京举办了“首届国际青春诗会——金砖国家专场”，邀请来自金砖十国的70多位诗人围绕诗歌创作进行深入交流。中外诗人通过学术对话、诗歌分享、文化采访、座谈交流等方式，彼此聆听、唱和应答，结下深厚友谊，筑起文明交流互鉴、文化交融互动的人文之桥。诗会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引起海外网友的热烈响应。诗会的成功举办彰显出中国文化的自信和开放，为增进各国人民的相互理解、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了独特贡献。我们坚信，随着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推进，中国文学必将拥有更开阔的国际视野、站上更精彩的世界舞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明，推动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是亿万人民共同的事业，是一个持续向前推进的过程。在中国这样一个14亿多人口的国家推进改革，需要集腋成裘的力量、形成最强大的合力。我们要充分发挥文学反映人民呼声、提振发展信心的独特优势，创造良好文化生态，激发社会创新活力，凝聚强大改革合力，形成全国各族人民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时代氛围，共同创造崭新的“人间奇迹”。

唐朝于公元618年建立后，经过近百年的巩固和发展，到唐玄宗李隆基在位的开元、天宝年间步入“盛唐时期”。这一时期，在政治秩序稳定、社会经济繁荣推动下，国家藏书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果。

唐玄宗即位后，十分注意从历史发展中汲取经验与教训。《旧唐书·玄宗本纪》载玄宗于“听政之暇，常览史籍”，特别重视“事关理道”的大环节、大问题。玄宗还明确认为“国之载籍，政之本源”，高度重视国家藏书建设。《旧唐书·经籍志》载，开元三年（715年）九月，玄宗与“更日侍读”的左、右散骑常侍马怀素和褚无量“言及经籍”，说“内库皆是太宗、高宗先代旧书，常令官人主掌，所有残缺，未遑补缉，篇卷错乱，难于检阅，卿试为联整比之”，提出了推进国家藏书建设的任务。为郑重其事，玄宗颁《赐褚无量马怀素诏》，诏命两人负责具体实施，并提出了“令经史详备”的目标。

在玄宗诏命下，大规模的图书整理建设不久即开展实施。从有关史籍看，马怀素和褚无量有着明确分工，又在元行冲、张说等人继任期间得以持续推进并取得显著成果。

马怀素主持秘书省编目工程。据新旧《唐书·马怀素传》，马怀素针对“秘书省典籍散落，条流无叙”的状况，于开元五年（717年）十二月上书玄宗，建议在南齐目录学家王俭所编《七志》基础上，将南齐以后至开元时的典籍汇编入一部目录著作中，以摸清当时国家藏书的实际情况。玄宗立即任命马怀素为秘书省长官秘书监，并命国子博士尹知章、四门助教王直、直国子监赵玄默等20余人“分部撰次”，在马怀素统筹之下分工协作。马怀素还奏请玄宗以秘书少监卢僔、崔沔为修图书副使，以秘书郎田可封、康子元为判官，完善了搜访逸书、刊正经史和分部撰录的工作机制。马怀素于开元六年（718年）七月病逝，所主持的编目工程只进行了一年半的时间，虽“未能有所绪别”，但“粗创首尾”，功不可没。开元七年（719年）七月，玄宗命元行冲接替马怀素，继续组织秘书省的编目工程。

褚无量主持乾元殿内库书校写工程。据新旧《唐书·褚无量传》，褚无量针对“内库旧书，自高宗时藏官中，甲乙丛倒”的混乱现象，“建请缮录补第，以广秘籍”。开元五年十二月，玄宗诏命褚无量为使，于东都乾元殿东厢部汇整比”，着手缮录校写工作。褚无量还上书玄宗，以闻喜县县尉卢僔等4人“分部釐定”，分工协作。有关史籍记载表明，褚无量主持的东都乾元殿内库书校写工程，是把内库藏书按甲、乙、丙、丁四库，分库上架排比、清理校刊。一年半之后，这一工程基本完成。开元六年八月，玄宗敕令“于秘书省、昭文馆、礼部、国子监、太常及诸司官等，借写及整比”，向乾元殿之外的藏书机构及国家官员“大加搜写，广采天下异本”，以补充内库藏书。同时，选调秘书丞殷承业、右赞善大夫魏哲等7人为丽正院（乾元殿改名）修书学士，还制定了编目要求及细则，继续推进内库藏书校写工程。开元八年（720年）正月，褚无量年老病逝，玄宗又命元行冲接替，继续“整比群书”。

元行冲主持秘书省、丽正院编目校写工程。元行冲先后接替马怀素、褚无量后，将先前由马、褚分工负责的秘书省、丽正院编目校写工程合并在了一起。据《唐会要·集贤院》等史籍记载，开元八年十月，玄宗敕令：“学士等入经三年已上，为年深。若校理精勤，纭纭多正，及不详覆，无所发明，委修书使录奏，别加褒贬”。元行冲奉敕修书学士不合格者，把合格的秘书省原修书学士陆绍伯、马利微、毋巽、韦述等13人转到丽正院，将秘书省的编目工程合并到丽正院。同时新选朝邑县县丞冯朝隐、冠氏县县尉权寅献等7人为丽正院修书学士，将学士总人数增

典籍管理与国家藏书

□ 刘玉峰

加到20人。元行冲进而按照“通撰古今书目”方法，依据丽正院实有藏书，有何书便著录何书，对20位学士作了工作上的划分，分别编目总籍、经部、史部、子部、集部。经学士们的集体努力，开元九年（721年）十一月，丽正院藏书的编目工程完成，修成“《群书目录》二百卷、藏之内府”。开元十年（722年）九月，元行冲衰老罢职，玄宗命宰相张说继掌丽正院藏书建设工作。

张说等人继续主持内库图书建设工程。张说奉命接替元行冲后，以秘书监徐坚为副手，又以张惟“知图书括访异书使”。在编目工程完成后，特设专使，专门负责搜求购募异书珍本，以努力扩充图书数量。与此同时，张说还奉命组织学士们进行重要著述的编纂。如《唐会要·集贤院》载，开元十二年（724年），玄宗命张说组织撰修《封禅仪注》，以应东封泰山之需。开元十三年（725年）四月，《封禅仪注》修成。为表彰学士们的功绩，玄宗赐宴于集仙殿，改丽正院为集贤院，并设“十八学士”。张说病逝后，张九龄、萧嵩、李林甫继以宰相相集贤院事，继续组织实施国家藏书建设。

国家藏书建设在开元、天宝年间取得了显著成果，国家藏书总量蔚为壮观。宋朝欧阳修、宋祁编撰《新唐书》时，不禁赞叹道：“藏书之盛，莫盛于开元，其著录者，五万三千九百一十五卷，而唐之学者自为之书者，又二万八千四百六十九卷。呜呼，可谓盛矣！”

玄宗朝整理撰修好的四库书分藏京师长安和东都洛阳，均以质量上乘的益州麻纸书写，在装帧上均为卷轴装，即宋朝欧阳修所谓“唐人藏书，皆作卷轴”。官修政典《唐六典》记载了当时四库书的储藏和装帧情况——“四库之书，两京各一本，共一十二万五千九百六十卷，皆以益州麻纸写。其经库书，钿白牙轴，黄带，红牙签；史库书，细青牙轴，缥带，绿牙签；子库书，雕紫檀轴，紫带，碧牙签；集库书，绿牙轴，朱带，白牙签。以为分别。”其用纸之高标准和装帧之考究，被现代学者誉称达到了“绝妙的境地”。另有学者在研究后指出，玄宗朝用不同颜色的轴、带、签以别四库书的做法，为清朝撰修《四库全书》所沿袭发展，以绿、红、兰、浅灰四色封皮以别经、史、子、集部四库。

